

# 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 年龄模式

The Age Pattern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mong  
Older Persons in Rural China

左冬梅 李树茁 [加]吴正 /著



西安交通大学 · 学术文库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 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 年龄模式

The Age Pattern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mong  
Older Persons in Rural China

左冬梅 李树苗 (加)吴正 /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年龄模式 / 左冬梅, 李树苗, (加) 吴正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2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5613 - 3

I. ①农… II. ①左… ②李… ③吴… III. ①农村 - 老年人 - 社会  
保障体制 - 研究 - 中国 IV. ①F323. 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7005 号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学术文库  
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年龄模式

著者 / 左冬梅 李树苗 [加] 吴正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周丽高雁

责任编辑 / 林尧

出版地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中心 (010) 5936722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格 /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2.5 字数: 211 千字

版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613 - 3

定价 / 6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总序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一直致力于社会性别歧视与弱势群体问题的研究，在儿童、妇女、老年人、失地农民、城乡流动人口和城镇困难企业职工等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发展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所注重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已承担并成功完成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及国际合作项目，在弱势群体、人口与社会发展战略、公共政策研究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研究所拥有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与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杜克大学、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南加州大学、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圣塔菲研究所等国际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的学术合作与交流关系，形成了研究人员互访和合作课题研究等机制；同时，研究所多次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计划、美国 NIH 基金会、美国福特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资助，合作研究了多项有关中国弱势群体问题的科研项目。国际合作使研究所拥有了相关学术领域的国际对话能力，扩大了国际影响力。

研究所注重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已形成了与国家、地方各级政府的合作研究网络，为研究的开展及研究成果的扩散与推广提供了有利条件和保障。研究所多次参与有关中国弱势群体、国家和省区人口与发展战略等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在国家有关部门、国际机构的共同合作与支持下，在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女童生活环境等领域系统地开展了有关弱势群体问题的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应用于实践，进行了社区干预与传播扩散。1989 年以来研究所建立了社会实验基地 6 个，包括“全国 39 个县建设新型婚育文化社区实验网络”（1998 ~ 2000 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巢湖改善女孩生活环境实验区”（2000~2003年，美国福特基金会、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社会性别引入生殖健康的实验和推广”（2003年至今，美国福特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其中，“巢湖改善女孩生活环境实验区”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各界对男孩偏好问题的重视，直接推动了全国“关爱女孩行动”的开展。

近年来，研究所开始致力于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方法、政策和实践的系统研究，尤其关注以社会性别和社会弱势人群的保护与发展为核心的交叉领域。作为国家“985工程”二期“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策与管理创新”研究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所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人口与社会复杂系统的一般理论、分析方法与应用研究——探索人口与社会复杂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人口与社会复杂系统的一般特征及结构，建立人口与社会复杂系统模型，深入分析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人口与社会问题并为其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人口与社会政策创新的一般理论、分析方法与应用研究——分析人口与社会政策创新的理论内涵与模式，人口与社会政策创新的政策环境、条件、机制、过程与应用，建立人口与社会政策创新评估体系；转型期面向弱势群体保护与发展的社会政策创新研究、评价与实践——以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研究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社会的融合过程，分析农民工观念与行为的演变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农村流动人口与社会后果，探索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的途径，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国家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与应用——在人口与社会复杂系统和人口与社会政策创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弱势群体研究所得到的结果，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从应用角度建立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形成相应的数据库、模型库、知识库和方法库，解决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战略问题。

中国社会正处于人口与社会的急剧转型期，性别歧视、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弱势群体生活困难等问题日益凸显，社会潜在危机不断增大，影响并制约着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有利于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以社会性别和弱势群体保护与发展为核心的人口与社会问题。本学术文库将陆续推出其学术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 目 录

<b>第一章 绪论</b> .....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概念界定.....	7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2
<b>第二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b>	17
第一节 家庭代际支持领域的研究 .....	17
第二节 相关理论 .....	25
第三节 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研究 .....	36
第四节 生命历程的研究范式及其对“年龄”变量的关注 .....	40
第五节 小结 .....	44
<b>第三章 代际支持年龄模式及分析框架 .....</b>	46
第一节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动态发展机制分析 .....	46
第二节 代际支持年龄模式 .....	55
第三节 代际支持动态年龄模式分析框架 .....	61
第四节 对代际支持年龄模式和分析框架的验证思路 .....	66
第五节 小结 .....	68

<b>第四章 数据采集 .....</b>	<b>69</b>
第一节 数据来源 .....	69
第二节 抽样及调查 .....	77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82
<b>第五章 老年父母代际支持的年龄模式 .....</b>	<b>87</b>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87
第二节 老年父母代际支持年龄模式及影响因素 .....	93
第三节 老年父母代际支持年龄模式分析 .....	100
第四节 小结 .....	114
<b>第六章 成年子女代际支持的年龄模式 .....</b>	<b>116</b>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116
第二节 成年子女代际支持年龄模式的影响因素 .....	122
第三节 成年子女代际支持年龄模式分析 .....	132
第四节 小结 .....	147
<b>第七章 结论 .....</b>	<b>151</b>
第一节 主要工作 .....	151
第二节 主要结论 .....	153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155
<b>参考文献 .....</b>	<b>156</b>
<b>附 录 .....</b>	<b>179</b>
<b>后 记 .....</b>	<b>192</b>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一 迅速发展的农村人口老龄化

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进步，人口死亡率快速下降，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在短短几十年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在这种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发生着重要变化，开始趋于老龄化。“老龄化”一词的含义既包括“增龄”所带来的人类个体老化，也包括整个人口群体的老化（杜鹏，2006）。而人口老龄化是指由于总人口中年轻人口数量的减少、年老人口数量的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国际上通常把 60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10% 以上或 65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7% 以上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达到老年型社会的标准。第五次人口普查确认中国在 2000 年已经是老年型人口（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0.46%；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6.96%）。根据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结果，2005 年底，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首次超过 1 亿人，达到 10055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7.70%；60 岁及以上的人口为 14422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1.03%，老龄化社会的特征更为明显（杜鹏、李强，2006）。与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相伴随的是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根据学者基于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所进行的分析结果，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城乡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在各年龄段上均增幅明显。1982 年，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预期寿命分别为 71.06 岁和 67.05 岁，2000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

达到 75.21 岁和 69.55 岁，2009 年则进一步增加到 77.33 岁和 72.29 岁（胡英，2010）。不同学者用不同方法、不同起点年份进行的预测均说明 21 世纪我国老龄人口高速增长已成定局（曾毅，2001）。根据杜鹏等学者的预测，预计到 2014 年，我国老年人口总数将突破 2 亿，2026 年超过 3 亿，2041 年将达到 4 亿。2030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为 16.3%，2050 年达到 23.2%。而 2050 年的平均预期寿命男性将达到 74.4 岁，女性将达到 79.9 岁（杜鹏等，2005）。

相较于其他人口老龄化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在历史成因和社会、政策背景上有其特殊性。总结起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几方面的特点。首先，发展速度快。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 18 年左右的时间，预计 1990~2050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2.6%，这个发展速度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是最快的，而且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王树新，2004）。其次，人口老龄化伴随着人口高龄化的同步发展。高龄化是指 80 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体老年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的一种人口年龄结构现象。由于高龄老人的死亡率下降逐渐成为老龄化进一步加深的主导因素，加上那些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逐渐步入老龄阶段，高龄老人的数量大幅度增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 80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规模将从 2000 年的 1150 万人增加到 2020 年的 2700 万人、2030 年的 3900 万人，并在 2050 年达到 9900 万人；这部分高龄老人占 65 岁及以上总体老年人口的比例将从 1990 年的 12.2% 增加到 2020 年的 19.0% 与 2050 年的 34.6%（曾毅等，2004）。高龄往往伴随着机体退化和健康状况的下降以及经济自主能力脆弱性的升高。高龄化趋势会给家庭和社会在提供支持和照料方面带来沉重负担。

除此之外，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城乡倒置”。农村不仅是中国老年人口最多的地区，也是老龄化程度和老年人口抚养比最高的地区。虽然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城镇，人口生育水平高于城镇，并且平均预期寿命低于城镇，但是从 1982 年至今，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日益高于城镇，并且这种趋势仍在继续（杜鹏、王武林，2010）。2000 年中国农村地区的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是城市地区的 2 倍多，相应的人口比重高达 7.35%（城镇比重为 6.30%），并且农村人口的高龄化程度也较城镇更

为严重。根据比较保守的预测，到 2050 年，农村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将比城镇高出约 13 个百分点（曾毅，2005）。导致农村老龄化形势严峻有人口自然变动的原因，但主要是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中存在的这种年龄选择性（Zeng 和 Vaupel，1989）。1978 年开始在中国农村开始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转折，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使得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开始凸显。同时由于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平等，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地区的迁移流动，而年轻劳动力构成了这部分人群的主体。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虽然只是人口发展进程中的阶段现象，但据预测，直到 21 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在此之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重心在农村，老龄问题的重心也在农村。

## 二 农村家庭养老及其当前面临的困境

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需求包括物质供养、生活和健康照料、精神慰藉等多个方面。养老保障可供选择的组织制度模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家庭养老模式、个人养老模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集体养老制度模式、社会救济养老模式和商业养老保险模式等（梁鸿等，2008）。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以血缘道义为内在特征的家庭养老模式最具长时间的稳定性，在当代中国农村它是占据主体地位的养老制度安排，在未来仍将是我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姚远，2001）。这不仅是由于家庭养老在中国，尤其是农村地区具有深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根基（王萍等，2011），而且也是受制于农村地区较为落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家政策和法律制度安排下的现实选择。

家庭养老这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单一分散的老年人供养方式，和其他养老方式相比，其关键在于家庭成员对于赡养老人代际责任上的文化认同（宋健，2006）。一方面，子女是父母进入老年后获得所需各种支持的主要提供者，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几乎成了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全部内容（Sheng 和 Settles，2006）。另一方面，老年人也不单是被赡养，他们在生活的大多数时间里可以自理，并可以为家庭生活继续做出很大贡献。在传统的责任伦理和家族绵延观念的支配下，农村老年人往往强调自己对后代的责任，从而继续为成年子女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杨善华等，

2004)。例如，在普遍缺乏日常儿童照料设施，儿童尤其是学龄前儿童的日常照料主要在家庭内部完成的中国农村，父辈更是帮助子女照料未成年孙子女的首要人选 (Silverstein 等, 2007b)。俗语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年人是家庭的宝贵资源，他们对于年轻一代的继续支持，对于减轻年轻一代的家庭负担，使年轻一代全力投入工作和实现自身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代际交换对于促进老年人及其子女包括孙子女的福利，尤其是对老年人的养老保障至关重要。

由于传统价值观、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和家庭伦理的变化以及土地收益的下降，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面临困境。政府在社会化养老体系建设方面严重缺位，然而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却在不断激增。在经济需求方面，由于无法享受城里老年人的养老金和退休金制度，辛苦劳作一生的农村老年人往往主要依靠子女的经济支持。这种情况在年老体弱的高龄老人中尤甚。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经济保障的问题将更加严重；在健康需求方面，杜鹏等人的研究发现，农村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都比城市高 50% 以上，其中农村女性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最弱 (杜鹏等, 2006)。而顾大男、曾毅的研究发现，在各年龄段的高龄老年人中，健康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例都是城镇男性高龄老人高于农村男性高龄老人、城镇女性高龄老人高于农村女性高龄老人，最低的是农村女性高龄老人 (顾大男等, 2002)。而在情感需求方面，由于子女不在身旁，农村留守老人的比例升高，农村老年人面临着无人陪伴的孤独境况。当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仍在不断加大，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照料等问题非常突出 (杜鹏等, 2010)。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没有存在的土壤，而新的农村养老模式尚未建立。因此，造就了我国农村养老的“真空”现象 (王萍等, 2011)。

### 三 社会变迁与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

目前，生活在农村的老年人从其出生、成长直至进入老年的整个生命历史阶段，经历了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直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他们大多数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进入老年的。因此，在他们整个的生活经历，特别是老年阶段中，正值农村社会变革最剧烈的历史时期。宏观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变化

必然要重新规范人的行为，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受到社会变迁的多方面的触动。

概括来说，社会变迁给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带来了以下六个方面的深刻变化。第一，随着人口寿命越来越长，家庭的代数也在增加，家庭代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从前寿命稍长的老人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的时间也不过几年（王树新，2004），生育和培养子女几乎贯穿于结婚后的全部生命周期，而现在的老年人却大多能够看得到孙子女一代的出生和成长，甚至包括第四代。不同年代的人在思想和价值观念上存在差异，使得代际关系趋于复杂化。第二，持续多年的低生育率改变了总人口中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结构比例，从宏观上看，使老年人口抚养指数上升和总抚养费用增加；从微观上看，造成了家庭子女数的剧减和家庭养老资源不足的问题。第三，农村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核心化使得各代拥有了更加独立的生活空间、减少了代际冲突和摩擦，但同时也影响到老年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及时性，使得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下降和家庭成员的生活风险加大。第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大量中青年剩余劳动力的外流使得中国农村家庭的结构和功能以及伦理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成年子女外出务工虽然可能增加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但同时也导致老年人潜在照料人数的减少，损害了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劳动力外流的规模仍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课题组，2006），这意味着大规模劳动力外流给农村家庭传统的代际支持所带来的挑战将持续存在。第五，现代化过程带来了农村妇女外出就业的增加，减少了家庭成员交流的机会，削弱了家庭的代际联系，更主要的是减少了她们为老人提供照料的时间（Beigel 和 Schulz, 1999; Koyano, 2000）。同时，经济能力的增强提高了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女儿在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等方面相对于儿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左冬梅、李树苗，2011）。第六，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传统养老文化变淡，年轻一代的个人主义代替了家本位的思想，“孝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体现在家庭关系中，家庭成员间关系变得更加平等，传统家庭意义上的老人在家庭生产中的权威性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更而丧失。夫妻关系的平衡重于婆媳关系和父子关系，代际关系出现重心下移的现象，“重幼轻老”现象成为农村家庭的一大特征。

虽然当前农村家庭养老处在变革期，但中国农村一直是传统文化和制度维系的沃土，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仍然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保存，家庭养老表现出传统和变革共存的特征（左冬梅等，2011）。家庭自产生起就具有养老的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家庭养老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而现代家庭仍将扮演着养老资源的提供者和养老职能实施者的基本角色。家庭内代际资源交换、年轻一代对于老年人的照料和精神慰藉是任何社会行为都无法替代的。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社会经济还处在相对薄弱的条件下迅速发生的，并以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经济全面深入改革为背景。结构调整与新旧制度衔接所带来的问题，家庭规模和结构变动引发的代际关系在供养方式、居住方式、交往和沟通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人们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等都加重了老年保障问题。

#### 四 代际支持行为的动态发展

代际支持是涉及多方面有价值资源的双向支持和交换的复杂问题，不同年龄、不同时代的老人和子女在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和情感支持各方面付出的能力及得到的需求不同，使得代际支持行为像个体发展一样，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一生中沿着一定的轨迹发展变化的。在中国，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最大的儒家学说更是为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提供了一个以严格的年龄等级和性别原则为中心的范本。年龄作为个人的一种性质，可以标志着心理成熟、个体发展、在更广泛的社会范畴内的成员资格（同期群）以及生命阶段等。早在 30 年前就有学者指出年龄仍然是“父母影响其后代过程中一个被忽略的方面”，呼吁社会科学家更加密切地关注年龄（Ravanera 等，2004；Riley，1987）。但是，这一建议至今仍然被学者们所忽视。年龄是影响子女和父母代际支持行为的显著因素（Cooney 和 Uhlenberg，1992a），但已有的关于年龄的研究结果仅仅是基于群体层面的思考，从中难以找到个体生命与世代变化的联系点，也无法用数据来解释为什么在同样的社会或历史条件下会出现个体发展的差异。

截至目前，以传统代际支持模式为基础，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上进行家庭代际支持模式讨论和因素修订的研究较多，但对于家庭代际支持行为的个体发展轨迹及其变化，从老人和子女两个角度对随时间变化所带来的代际支

持行为改变的研究非常少见。已有的关于代际支持的系统研究多局限于基于生命时间的维度，即符合人们日常概念中的年龄。这种仅仅按生命时间划分群组的研究很难用社会或历史因素解释群组之间的差异，也无法发现生命与时间变化的联系。这种局限，部分是由横截数据本身的限制所带来的，但主要是因为没有从生命历程的时间观视角来界定年龄，因此对家庭养老机制缺乏深入、完整而准确的认识。

本书从家庭内部老年父母与子女的互动过程中思考和研究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行为的年龄规律和发展模式，有利于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理解社会变迁对家庭代际关系的作用和代际交换行为变动的过程，可以对今后建立和完善农村的养老保障和社会支持体系、开展农村社区老年服务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这对减轻家庭成员的养老负担，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改善农村家庭的养老扶幼功能，逐步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的转移均有着重要意义。

将生命历程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以年龄为纽带纳入代际支持研究中去的策略成为可能，是研究家庭代际支持动态演化的一个全新而有效的思路。生命历程本身是一种跨学科的视角（Shanahan, 2000），本书将目光放到个体所生活的整个社会系统之中，从宏系统、中间系统和微系统中寻找代际交换行为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相关研究很少见。本书以生命历程作为研究的方法论指导，系统研究农村代际支持的年龄模式，不仅为研究家庭代际支持行为的动态发展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而且将丰富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内容，拓展其应用领域。本书进行的生命历程理论及其社会应用研究，对于加速我国跨学科研究与应用具有积极意义。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一 代与代际支持

“代”（Generation）是指世系的辈分，它是在时间刻度上对于不同时期人的一种划分，一般用代际间隔即代与代之间在时间上的跨度来表示（王树新，2004）。作为传承的社会时间视角的“代”（刘德寰，2007），总体上

是按照年龄来加以界定的。正因为“代”的概念有助于理解发生在个体和家庭的私人领域内以及公共领域内的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辨识和解决各种类型的社会问题。因此在许多学科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应用，可分为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社会层面上的运用。微观层面上“代”的概念强调在扩展家庭中的血缘亲情背景，例如父代、子代；而宏观层面上“代”的概念常代替“队列”（Cohort）特别是“出生队列”（Birth Cohort）来使用，主要是指处于同一时期的不同年龄阶段的群，是从同期人角度定义的概念，例如80后、90后。后一种“代”的含义有时和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相联系，例如经历过“文革”的一代、经历过经济大萧条的一代等。由于属于同一“代”的个体在社会和历史发展进程中居于相同的位置，因此，在宏观层面上常常将其用来作不同年龄的人群之间关系的结构分析，比如制度差异。并且“代”的发展和继承常被认为是促使社会变迁的深层次动力（Mannheim, 1952），这方面的讨论集中于诸如社会资源的代际竞争以及促进代际公平的公共政策等问题（Biggs, 2007）。虽然“代”和“队列”二者在含义上具有重合之处，但本文同意Ryder和Riley的观点，即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相比队列而言，“代”概念的时间跨度更大（Riley, 1987；Ryder, 1965）。本文所指的“代”更接近其原意，即微观层面上作为一种亲属关系结构的单位。

代际关系的含义是随时间不断变化的，“代际”这个概念至少包括两个不同的年龄组：父代和子代。然而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学界对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逐渐扩展到了三代甚至四代。本书仍然以老年父母（G1）和子女（G2）两代人作为研究对象的主体，但同时也将第三代（即孙代G3）家庭成员对G1和G2间代际资源交换的影响考虑在内。本研究中“代际支持”是在中国农村普遍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Family Support）方式下的代际支持，是基于家庭的纵向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代际成员作为不同的行为主体间的资源交换行为。和一般的“交换”行为不同的是，首先，代际交换在行为主体上具有特殊性；其次，代际交换在行动方式上的特殊性。一般的交换关系没有义务性和强迫性，是在互利互惠前提下做出的选择，法律并不干预。而代际支持往往被规定为一种抚养和赡养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家庭关系，带有硬性约束性质。

经济支持（Financial Support）、生活照料（Instrumental Support）和情

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构成了家庭代际支持（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的主要内容。其中，经济支持指老年人与子女之间提供的现金、衣物、食品等实物帮助；生活照料包括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提供的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帮助（Household Chore Help）和穿衣、喂饭、洗澡等日常生活起居照料（Personal Care）。除此之外，本书还将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的孙子女照料纳入他们为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当中；情感支持指老人通过倾诉、谈心等交流行为获得的感情慰藉，是子女与老年人之间相处的感情融洽（Emotional Closeness）程度的重要标志。另一个与代际支持非常接近的概念是微观意义上的代际交换（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相比于代际支持，代际交换更加强调家庭代际成员间相互提供的支持，其本质上是资源在家庭内不同代的成员之间的交换。本文所界定的代际交换既包括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也包括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的经济帮助和家务、照料未成年子女等日常生活帮助。因此，代际交换和代际支持这两个概念在本研究中可以互换使用。本书中的情感支持是指代际的感情融洽程度，是一种双向交互的情感交流，所以没有根据方向进一步划分。

## 二 年龄

年龄，作为个人的一种性质，可以标志着心理成熟、心理发展、在更广泛的社会范畴内的成员资格（同期群），或者生命阶段。在对社会很多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时，都会涉及对其年龄构成的分析。但是直到最近四十五年，学者们才开始对这个概念中所包含的多种含义加以深入解析和认识。如今的社会学将年龄看作一个客观的生理事实，同时强调生理年龄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个人的经历、角色、社会地位都常常和年龄有着联系（Richard 和 Mayer, 1997）。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年龄不是一成不变的或自然形成的，而是和社会性别一样，是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创造及再造产生的。年龄的生理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间的差异与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社会性别（Gender）间的差异相类似，因此，不少学者们致力于“年龄社会学”的研究，认为可以像讨论社会性别那样对年龄建立类似的分析框架（Laz, 1998）。

年龄的测量虽然简单，但它却是一个复杂的属性变量（Riley, 1987）。对年龄数据的理解可以从以下时间维度和空间性质上进行。第一，个体从出

生到死亡的生命时间或生命跨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定义出“生理年龄”的概念，它 can 用来大体划分个体老化进程的阶段。第二，个体生命历程中生命阶段和角色转换（如结婚、退休、生育子女）的社会时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定义出“社会年龄”的概念，实际上是角色转变的一种社会约定俗成的年龄方面的规范。第三，社会变迁进程中的历史时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定义出“历史年龄”的概念，即年龄标志着个体从出生之日起进入特定的社会空间。

年龄概念在生命历程理论中居于核心的位置。它跨越了个体层面，体现出了个体、社会和历史三种从微观到宏观再到纵向的空间里对事件和角色等生命历程轨迹的建构（包蕾萍、桑标，2006），它是个体生命、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的重要联结点（包蕾萍，2005）。本文借助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范式，对年龄概念进行多重的解析，将生理年龄（Chronological Age）也简称为年龄，社会年龄用定义出的家庭生命阶段来测量，历史年龄用所属的出生队列（Cohort Membership）来测量。

### 三 队列

队列（Cohort），也叫同期群，是指在相同时期经历了同样事件的个体的集合（Ryder，1965）。同时出生的一群人构成一个出生队列，在横截面数据中，他们具有相同的年龄。由于历史事件和条件对于同期队列的成长、变老、死亡等阶段会造成特定的冲击，这种相同历史时期成长的个体集合具有共同的性质基础，称之为队列效应。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以前，有关社会变化和生活模式（Life Pattern）的研究沿着各自的方向发展，但社会的发展使得社会变化和生命历程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研究生活模式和社会历史变化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性。最早涉及历史时间作用的研究来自曼海姆（Mannheim）关于“代”或称“世代”（Generation）的讨论（Mannheim，1952），这里所说的“代”实际上就是出生队列。队列本是在人口学和流行病学中普遍使用的概念，由雷德尔（Norman Ryder）在 1965 年的论文《社会变迁研究中的同龄群体概念》中引入到社会学的研究中（Ryder，1965）。Ryder 认为，人所属于的队列标志着其所属于的社会阶层，队列和其他社会阶层划分一样都是具有解释力的代理指标，标志着同一类型的人群所具有的共同经历。所以，忽略队列就等于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